

第五章

「中華民族論」與「日本民族論」

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中的血緣民族論

近代以來中國主流社會的民族主義思潮，具有一個極其重要但又常常被疏忽的特點，那就是同時具有對外的排外意識和對內的民族歧視兩個側面。從這一點來看，多民族國家中國的近代民族主義與高度單一民族化之日本的近代民族主義之間應該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其實不然。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之所以同時具有這樣兩個側面，同樣與接受了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本書以上章節已有涉及。本章則試圖從解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兩個側面之間的互動關係入手，分析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思想之間的共性和各自特點。眾所周知，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最鮮明的象徵符號就是「中華民族論」，而中日戰爭時期的「中華民族論」又將民族主義對外與對內的兩個側面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本章將從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中國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於1943年3月所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所引起的論戰談起。事實上，關於此書中所表現的「中華民族論」的性質，至今仍是眾說紛紜。¹

第一節 蔣介石「中華民族論」中的「民族融和論」

《中國之命運》所表現的「中華民族論」，集中在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中。從《中國之命運》書名中即可以看出，蔣介石之所以此時大談「中華民族」，就是為了將所有的國人都強有力地統合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之下，以便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所以毫無疑問，該書所表象的「中華民族」其實就是「國族」。蔣介石的這種「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隨即招致中共的批評，指責他提出的中國只有一個民族、其他少數民族集團都是「宗族」的說法是「大漢族主義」思想的表現，背離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中國學界也一直沒有忘記這個話題。近年，隨著中國國內民族問題的凸顯，孫中山即已大力提倡「國族」已經對近代中國內部各民族之間關係產生影響的事實得到重視，於是又有人一反過去中國國內學界說法，開始批評《中國之命運》不僅繼承了孫中山的「同化」（即主張或希望將各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同化於「漢族」）思想，還進一步提出了主張「漢」與「少數民族」來自於一個共同祖先的「同祖」思想。

但是筆者認為，在理解《中國之命運》所表現出的蔣介石「中華民族論」的問題上，前一種說法沒有尊重歷史事實，後一種說法則是將問題簡單化，都無法幫助我們從結構上理解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論的性質。這裏首先必須指出的是，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並沒有背離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正是孫中山本人，在其《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即開門見山地指出：在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即是《中國之命運》中所提出的「國族」由「宗族」構成的說法，事實上也是源於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他在第五講中清楚地指出：「依我看起來，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

當然容易聯絡得多。」²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當時針對蔣介石書中所說的中國只有一個民族所進行的批評，顯然是罔顧事實，帶著想把自己裝扮成孫中山思想繼承人的私心。

其次需要看到的歷史事實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其實已經在努力避免對少數民族造成推行「同化」的印象，因為該書第一版就已經很少使用「同化」一詞；而到了修訂版中，「同化」一詞被全部刪除。這件事足以說明：蔣介石當時已經意識到，在處理國內各個民族間關係上，「同化」是一種不得人心的話語。因此，批評《中國之命運》繼承了孫中山的「同化」思想，顯然是將蔣介石的「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簡單化了。

孫中山早期的中華民族論是將其他民族，尤其是滿族排斥在「中華民族」外的：「我們一定要在非滿族的中國人中間發揚民族主義精神：這是我畢生的職責。這種精神一經喚起，中華民族必將使其四億人民的力量奮起，並永遠推翻滿清王朝。」³這種思想一直持續到他成為臨時大總統時，⁴甚至到了更晚時期，他還不時會流露出視滿族為「異族」的思想。直到1910年代末期，孫中山方才提出了「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舉瑞士「合日耳曼、以大利、法蘭西三國之人民」「成為一瑞士之民族」，更舉美國「合歐洲之各種族而熔冶為一爐者」為「美利堅之民族」的例子，提出在中國合五族為一個「中華民族」：「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⁶

之後，孫中山數次提起建設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的必要性：「我們中國許多的民族也只要化成一個中華民族」，⁷「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⁸從這些表述方式來看，此時孫中山的中華民族思想好像是受到了美國的熔爐論的影響。然而深入分析就會明白，孫中山從美國的熔爐論中所得到的「積極的民族主義」的啟示，

實質上不過是一種通過進攻性的積極手段，將其他少數民族「同化」到「漢族」中來的思想：「美國底民族主義，乃積極底民族主義。本黨應以美國為榜樣。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並且為其他民族加入我們組織建國底機會。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故將來無論何種民族參加於我中國，務令同化於我漢族。本黨所持底民族主義，乃積極底民族主義。諸君不要忘記。」⁹

也就是說，對於孫中山而言，最理想的「中華民族」，自始至終不過是一個改名換姓的「漢族」而已：「自推倒滿洲，民族主義已算達到一消極之目的，而向未做積極的功夫。吾人應為漢族發揚光大，令彼與我共同建國之各民族同化於我，而於東亞大陸建一中華民族底國家，使漢族威名遍揚寰宇。」¹⁰直到其晚年，孫中山一直沒有放棄將其他的少數民族「同化」到「漢族」中來的念頭：「講到五族底人數，藏人不過四五百萬，蒙古人不到百萬，滿人只數百萬，回教雖眾，大都漢人。……漢族號稱四萬萬，或尚不止此數，而不能真正獨立組一完全漢族底國家，實是我們漢族莫大底羞恥，這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沒有成功。由此可知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民族主義的國家。」¹¹按照孫中山的「漢族主體論」或「漢族中心論」民族主義思想中設計的「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不是「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中華民族」，而是「A+B+C+D+E=A」的模式。

從「中華民族」=「國族」的思想實質上看，蔣介石的中華民族論無疑是繼承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之命運》卻沒有一處提到要將其他「宗族」（即少數民族集團）同化於「漢」；前文已經提到，即使增訂之前的《中國之命運》就很少使用「同化」，而是大量使用了「融和」、「融合」或「融化」等表現。它關於「中

華民族」的形成方法，基本上是使用「融和」、「融合」和「融化」來進行表述的：「我們中華民族是由多數宗族融和而成的。……他們各依其地理環境的差距，而有不同的文化。由於文化的不同，而啟族姓的分別。然而五千年來。他們彼此之間，隨接觸機會之多，與遷徙往復之繁，乃不斷相興融和而成為一個民族。但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¹² 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出，《中國之命運》所表現出的蔣介石的中華民族論，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之間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並非主張通過同化論、而是主張通過融合論來實現「中華民族」。

「同化」與「融和」，二者原意有很大的區別。¹³ 「同化，指某個人口集團與具有異質的文化和言語的人口集團接觸，造成在學習和接受異質的文化和言語的同時丟棄自己的文化和語言的過程。」¹⁴ 「同化政策，一般指統治民族的統治階級強制推行的消滅被統治民族的民族特點的政策。」¹⁴ 而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則根據他們的調查得出結論：「同化主義催生民族分裂主義，而多文化主義似乎更能夠促進民族融合。」¹⁵ 無疑，無論是「民族同化論」還是「民族融合論」，其最終的目標都是要消滅不同族群的文化特徵。但是，「民族同化論」建立在大民族集團對少數民族集團的歧視和強迫之上，而「民族融合論」則具有尊重少數民族集團意願的成分。

其實，在近代國家形成的階段上，許多國家都選擇或曾經選擇「民族同化」為實現「國民統合」的手段。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也一直具有一個如何使新移民「美國化」的問題。¹⁶ 在十九世紀時，所謂的 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提出了「同化論」，即要讓移民放棄自己的文化而「同化於美利堅文化」；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才出現了「融合論」，「讓多種多樣的民族平等地融合成為新的美國人」。¹⁷ 而這種「民族融合」(national amalgamation)，也是蔣介石認為中國應該所走、而且已經走過的道路：「所有全領域內的宗教、哲理、文學、藝術、天文、術數、法律、制度、風俗、民情，亦已網

絡綜合而冶於一爐。」¹⁸ 從這裏可以看出，蔣介石的中華民族論所嚮往的，正是將中國變為類似美國那樣一個各民族的大熔爐 (melting pot)，通過融合而建立的美國式的「民族」。也就是說，在關於採用何種方式形成「中華民族」的問題上，比起口頭上稱道美國製造「美利堅人」之方法的孫中山來說，其實只有蔣介石所主張的民族融和論才真正接近美國的熔爐論。

更重要的一點是，與孫中山所提出的製造「中華民族」的思想不同，蔣介石明確地提出了「中華民族」是在悠久的歷史過程中通過各個不同民族集團的互相融合而自然形成的思想。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的產物，也是一個歷史過程，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秦漢時代，中國的武力彪炳於史冊，而跡其武功，在北方則是為民族生存求保障，在南方則是為民族生活求開發。……由於生活的互賴，與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數宗族，到此早已融和為一個中華大民族了。」¹⁹「隋唐大一統的局面，實為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民族融和的總收穫。這個時期，民族之內，宗支之繁多，文化之豐盛，舉蔥嶺以東，黃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領域內的宗教、哲理、文學、藝術、天文、術數、法律、制度、風俗、民情，亦已網絡綜合而冶於一爐。」²⁰「契丹(遼)與女真(金)……雖先後入據中原，然他們仍先後浸潤於中原的文化之中。蒙古……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獨融化於中華民族之內。滿族入據中原，其宗族的融化，與金代相同。故辛亥革命以後，滿族與漢族，實已融為一體，更沒有歧異的痕跡。」²¹「迄於清代，則農工商業的經營，更全賴漢族的努力，即滿族亦融化於中華民族之中。總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的記錄。此共同之記錄，構成了各宗族融合為中華民族，更由中華民族，為共禦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國國家悠久的歷史。」²²

從以上表述可以看出，蔣介石的中華民族論，其實是通過對歷史的再解釋，證明中國各個民族集團已經先天地「融合」成為了一個

「中華民族」=「國族」。也就是說，他只是希望通過強調這個先天的既成歷史事實來說服非漢民族集團認同中國為自己的國家，以達到統合國民的目的。其中既沒有露骨的大漢族中心思想，也沒有表露出形成「中華民族」需要以「同化」少數民族集團為基礎的意識，更沒有像孫中山一樣將「同化」作為一個後天製作「國族」之必要手段。蔣介石所提出的這種經過歷史上的「民族融和」而先天形成的中華民族論，與孫中山主張的漢族中心論和通過後天的「民族同化」而形成的中華民族論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當然，蔣介石筆下「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也是在近代出於政治的需要而被想像出來的。

第二節 《中國之命運》中的 文化民族論與血緣民族論

《中國之命運》在敘述「各宗族融合為中華民族」之歷史過程的時候，有時也會使用「他們」和「我們」。這種寫法不免讓人生疑：蔣介石在執筆《中國之命運》時，是否還站在漢族的立場上展開其「中華民族論」的？但是如果進行了客觀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的「我」或「我們」，其實是站在被想像出來的「中華民族」之立場上而使用的：

可知中華民族意識的堅強，民族力量的彈韌，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華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異族入據中原，中華民族必共同起而驅除之，以光復我固有的河山。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華民族於解除他互相軋礫、互相侵陵的痛苦與禍患的同時，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鄰的宗族，成為我們整個民族的宗支。簡言之，我們中華民族對於異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